

# 梅花桩

王族友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城区还很小，过合安路往东就是连片的田野。合九铁路快通车了，火车站建在离城五里远的地方，需要修条路过去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条路的施工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。

那时正年轻，既没有什么处事经验，也不在意什么规矩，单纯得要命，好在遇到的一把手老领导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他带我刚从收割的田野里蹚了一遭，一路上指点：“从那里修到这里，然后拐弯到前面水沟那边，再转弯到火车站，县里要修五十米宽。剩下的就是你的事了，可行？”“嗯，行吧。”尽管我心里没多少底，但老领导当面把任务交代了，那就含糊不得。

那时不只我单纯，整个社会似乎都不复杂。我们把边线一放，附近村民就把边界沟挖出来，感觉就像自发出来尽义务一样。不到两天功夫，田归田，路归路，泾渭分明了。我们的民工队伍就顺利进场了，挖的挖，挑的挑，缺少施工机械，全靠人挑肩扛，整个工地人声鼎沸，热火朝天。年关的时候，除了中间那几口水塘，车站路的雏形已现。

年后复工，大水塘就成了这条路绕不过去的槛。乡亲们说：“修路占了田地，我们认了，但这水塘真的不能毁，剩下的田地还要靠它灌溉，一塘水一仓粮，毁了水塘我们就得喝西北风。”民以食为天，这些淳朴的乡亲说得十分在理。我们也想在旁边挖塘还塘，但受地形限制，再加没有机械仅靠人力，挖塘难度太大，几次会商都定不下来。最后又是善良的乡亲们让步了，他们建议不要放干塘里的水，直接往塘里填土。这样的话，塘里的水还可以为他们浇灌最后一季稻子，以后他们就改种旱地了。我真的为乡亲们的善良所感动，当黄土一担接一担倒进水里，气泡一串接一串咕噜咕噜窜上来的时候，个中滋味难以言表。填塘的速度，我们把控得很好，当乡亲们满心欢喜开镰割稻的时候，这几口大水塘也适时地被黄土塞满了。

这以后，对我来说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一般填水塘修路，都是先抽干水，将塘底的淤泥清掉，然后再一层层填筑，一层层

压实，最后还要测控填土的沉降量。可眼下这水塘里，不仅没有清淤，没有压实，还是带水倾填的，泥土放在水里一搅和，其实就是烂泥浆！望着这烂泥潭，我陷入沉思。修路是要跑车的，眼前人站在上面稍一用力，满塘就像牛肚腩一般地颤动起来，将来怎么能行车？如果将这烂泥反挖出来，见底后再换土回填，是个最稳妥的办法，那时处理公路路基的“弹簧土”，基本就用此法。但这几万方烂泥挖出来，要费多少人力不说，这么多烂泥无论堆在哪儿，都是一座山！乡亲们为了修路，已作出了不小的牺牲，总不能再把这烂泥堆到人家庄稼地里吧？苦思冥想，真无良法。

静置了一段时间，也查阅了不少资料，每天经过时也要停下来看看这几口烂泥潭，发现填土面在慢慢沉降。这倒是个好消息，按理说，只要能想办法把混在烂泥中的水排出来，一段时间以后，这烂泥就能自然沉降固结，最终达到路基所要求的强度和压实度。那时我们国家处理软基最常用的就是换填，海外最先进的是塑料排水板，排水板的原理我懂，但真的想用也不亚于上天摘星星。反向思考，用人工挖孔灌砂桩，不也一样可以排水吗？那时年轻气盛，想到就干，不愿总憋着。赶紧从龙眠河里拉了两车砂砾石，放在边上做备料，自己带两个民工开始挖孔，直径一米多，一个人在里面操作绰绰有余，另一个人在上面警戒，轮流作业，既轻松又安全，半天不到，就挖好了两个井孔，井底慢慢渗出水来，看来有效。我们赶紧把砂砾石填进去，形成了两根砂砾石桩。

第二天来一看，桩周地面下降了足有二三公分，周围积了一滩水，显然是烂泥密实了，烂泥里的水被挤出来了！初战告捷，值得推广。于是招呼大家齐动手，各个塘口都在挖孔，间隔两米，呈梅花状分布，砂砾石一填进去，就是一塘梅花桩。老领导听说了，甚觉蹊跷，赶过来看究竟，当看到水从桩里渗出时，转忧为喜。“年轻人，就喜欢搞点鬼名堂！”笑着回去了。

效果当然是明显的，半个月过后，拉材料的车子已能从塘口碾过，半年后测弯沉，已与其他路段没有差别，甚至还优于其他填方段。

现在三十年过去了，原来的农田已是高楼林立，这条路已是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心主干道，名字早就分段改成“龙眠东路”“盛唐路”和“海峰路”了，梅花桩还静静地扎根在地层里，应该还在顽强不屈尽忠竭力。每每散步经过这些路段，我总想起那段青春岁月，怀念那个干事易的单纯时代，怀念那些善良的乡亲，这些高楼大厦应该就是他们当年付出的回报吧。



暗香 余伟 摄

## 第一次写信

胡 铭

45年前父亲到北京出差，一天晚上倾盆大雨，地面积水横流，路上的窨井盖被撬开，斜盖在井口上。父亲正好路过，一脚踏上去，咣的一声，窨井盖旋转了一下，紧紧卡住父亲的腰部，幸运的是，父亲没有完全坠入深深的窨井，不幸的是，落下了后遗症。

回来后，当作腰伤来治，没有效果，又当作肾炎来诊，也不见好转，这样反反复复，拖到第二年，病情越来越重，以至于不能正常行走了，是否有误诊的可能？父亲感到不妙，当机立断：出院，去上海。

春天的码头，温暖和煦。客轮渐渐驶远，父亲和母亲一直站在甲板上不停地招手，父亲酸楚的笑容越来越模糊，我在岸上同样报以假装淡定的微笑，双手举得高高的。晚上，我忍不住，也不想再忍了，一人躲在房间里嚎啕大哭。那一年，我读小学五年级。那一天，是父母第一次离开我的身边。

因为太小，我寄宿在外婆家，吃饭、睡觉都在那。我家是破旧的两间老屋，可我还是很愿意去看一看，坐一坐，每天一次或两次。

我静静等待一件事，收取信件，来自上海的信件，这是我和母亲事先约好了的。

那个年代的通讯方式主要是信函、电报、电话。电报是急事才用，按字收费，每个字三分钱；电话还不普及，只有一些单位配备；打长途电话得到邮局才行。最方便最适用的当然是信函了，几页纸装进信封，贴上八分钱邮票，塞进邮筒里就可以了。

一周左右，终于盼来母亲的信，我颤抖地拆开。父亲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住进医院，母亲也找了个旅社，按月结账，划算些，她还叮嘱我要听话，好好学习。一封信，我看了好几遍，放在书包里，很重。

晚上我匆匆做完作业，然后郑重地拿出信纸。“亲爱的爸爸、妈妈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写信。我告诉父母，外婆和舅舅对我非常好，平时给我零用钱，每天都会烧一些长眼睛的菜，而且变换着品种。我的学习状态良好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我提醒父亲多注意休息，平时少看一点书，提醒母亲照顾父亲的同时千万别苦了自己。落款还不忘写上“铭儿叩上”几个字，这“叩”字是从父亲来往信札

中学到的。满满三页纸，和着泪写的，文字中却不见一丝悲凉，我不希望他们有过多的担心和焦虑。

母亲说我的信写得真好，还自豪地拿给旅社的服务员看，服务员称赞我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，还好奇地问，“长眼睛”的菜是个什么菜？母亲笑答，就是指鱼虾和肉之类的荤菜。那位服务员姓沈，人非常好，对母亲也特别关照，每次写信我都要附上一句：代向沈阿姨问好。现在算来，这位阿姨已90开外了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周又一周，父亲的病还在治疗，母亲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，我接信后立马回复。心中的念想，化成一段段文字，在安庆与上海之间传递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依稀记得当时的地址：上海市顺德路红哨旅社。

曾有一个传言，让我非常震惊，说父亲在上海病逝。前几天母亲还来了信，只是说父亲可能要做一个大手术，没想到流言竟流得离谱。不过说真的，一种莫名的恐惧爬上我的心头。

走进一家杂货店，望着营业员的脸，我犹豫很久，最终还是掏出捏得皱巴巴的零钱，买了一包东海牌香烟，像做贼似地藏在自己的家里。擦划一根火柴，手中的香烟冒起了烟雾，吸一口，有点苦，又有点呛，不知是想麻醉自己还是刺激自己，我接着吸第二口、第三口，一支香烟慢慢烧到了烟屁股。这是我第一次抽烟。

香烟并不好抽，可第二天我又拿出一支，心想，等父母回来我就不抽了。就这样，一天一支烟，也是在计算着过去和以后的日子。我兴奋于一包烟快要抽完，苦恼于是否要再买一包。

吸烟不是有瘾，只是寻找一种慰藉方式。每次抽完，我都将烟头扔得远远的，不在家里留下痕迹，怕招来责骂。

暑假，终于在期待中来临，母亲回来接我去上海。“爸！爸！”在楼梯过道我就大喊起来，父亲缓缓站立，我扑上去一阵痛哭，足足发泄了十几分钟。父亲让我去给他买包香烟，我说我也学会吸烟了。“小孩子不能抽烟！”父亲皱着眉，声音不大却带严厉。我撒娇地说，太想你们了。我抚摸着父亲的脸，抚摸着父亲的腰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无须再写信和抽烟了。好轻松，真的！

